

绪论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 (Kenneth Rexroth, 1905-1982) 是 20 世纪美国著名诗人, “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 发起人, 因其诗歌的巨大影响被誉为“垮掉一代之父” (qtd. in Hamill and Kleiner: Introduction xv)。雷克思罗斯在 20 世纪 40 年代出版的两部诗集奠定了其在美国诗坛的地位, 即《在何时刻》(*In What Hour*, 1940) 和《凤与龟》(*The Phoenix and the Tortoise*, 1944)。他的主要诗集还包括《世俗智慧的艺术》(*The Art of Worldly Wisdom*, 1949)、《万物印记》(*The Signature of All Things*, 1950)、《龙与独角兽》(*The Dragon and the Unicorn*, 1952)、《心的花园、花园的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 1967) 以及《晨星》(*The Morning Star*, 1979) 等。

雷克思罗斯不仅是一位具有多种文化背景的诗人, 他也是一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 同时他还写诗剧和自传, 出版诗集二十五部、文学评论集十部、剧作一部, 可谓著作等身。此外, 他还翻译了多国诗歌, 包括中国、日本、法国、希腊和西班牙。他的译作很受欢迎, 尤其是他翻译的中文和日文诗歌, 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中国读者与学者而言, 雷克思罗斯最初受到关注是因为他在 20 世纪中叶翻译了许多中国诗歌, 其中包括《中国诗一百首》(*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56), 《爱与流年——续中国诗百首》(*Love and the Turning Year: One Hundred More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70), 《爱情、月亮和风的歌——来自中国的诗歌》(*Songs of Love, Moon & Win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70), 以及与学者钟玲合译的《中国女诗人选》(*Women Poets of China*, 1972) 和《李清照诗词全集》(*Li Ch'ing-chao: Complete Poems*, 1979)。

雷克思罗斯热爱中国文化, 为此他学习汉字, 尝试用汉语写中文诗歌, 并以中文名字“王红公”发表作品。显然, 雷克思罗斯受到他的诗歌创作偶像埃兹拉·庞德 (Ezra Pound) 的深刻影响。然而与庞德不同的是, 雷克思罗斯并没有拜东方学者为师, 这一切都是自修得来。因为家境贫寒, 加之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 他一生只上过两年学, 但他终生勤奋自学, 博览群书, 其渊博的知识在美国现代诗人中可谓佼佼者。雷克思罗斯在十五六岁时读了庞德

的《华夏集》(*Cathay*)，他被其中涉及的中国诗歌的境界、视阈、意象、情感模式以及语言特征所折服，由此雷克思罗斯迷上了中国诗歌。十九岁时他遇见诗人威特·宾纳(Witter Bynner)，在宾纳介绍下，雷克思罗斯开始真正学习与研究中国诗，尤其是杜甫的诗作。雷克思罗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试图寻找一种新的创作方式，让美国诗歌从“宏大而高贵”(Hamalian, *A Life of Kenneth Rexroth* 73)的主题中解放出来。他读了庞德编辑的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ellosa)的论文《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s as a Medium for Poetry*)和宾纳与江亢虎翻译的《唐诗三百首》(*The Jade Mountain*)，似乎在中国诗歌中找到了新的诗歌创作路径。雷克思罗斯认为以杜甫诗歌为代表的唐代诗歌是沉思的诗歌，其胜于华兹华斯的诗歌，在西方诗歌中只有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萨福(Sappho)的诗才具备这种诗歌的力量(Rexroth, *Classics Revisited* 127)。

雷克思罗斯不仅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技巧，还创作出不少具有典型山水意象的“中国诗”。赵毅衡认为雷克思罗斯是少数美国现代诗人中学到中国诗风抒情气质的诗人(53)。他在诗歌创作中吸收了中国佛家以及道家思想，成为美国诗坛中主动选择并吸收中国文化思想成就最大的诗人之一。雷克思罗斯对西方文化以及宗教传统感到不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状也感到不满，而中国文化恰好能满足他内心的需求，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西方文明所欠缺的智慧。雷克思罗斯认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代表西方文学最高成就，其诗歌传递的是生命的价值在于友谊、忠诚、勇敢、崇高、爱情和人与人之间的直接沟通。在雷克思罗斯看来，伟大的中国古代诗人也在表达同样的主题，所不同的是中国诗歌没有关于宇宙价值观的正误判定，“在他们作品中人类及其美德只是宇宙一部分，就像顺流而下的水、屹立的岩石与缥缈的薄雾一样”(Rexroth, *Birds in the Bush* 18)。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以其独有的东方文化特色在美国当代诗坛独树一帜。

雷克思罗斯诗歌中存在中国元素的事实如今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但雷克思罗斯究竟借鉴了什么中国元素，中国影响到底有多深，仍然没有定论。雷克思罗斯主要吸收了儒释道中哪种思想文化，他所接纳的这些概念在其诗歌中产生何种变异，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深入思考。

一、雷克思罗斯研究综述

评论界曾长期只关注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翻译的诗歌作品，对其研究重点放在他的翻译观和翻译策略上。虽然雷克思罗斯第一部诗集《在何时刻》出版于1940年，随后他又陆续出版几部诗集，但真正令他在美国诗坛获得重视的是1956年出版的中国诗歌翻译集《中国诗一百首》。雷克思罗斯认为美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对其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33），他还认为他对杜甫诗歌的翻译比自己创作的诗歌更好（Rexroth, *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xi）。他翻译的杜甫诗进入美国文学的选集中。1969年史蒂芬·伯格（Stephen Berg）编写的美国当代诗选《赤裸的诗：近来开放形式的美国诗》（*Naked Poetry: Recent American Poetry in Open Forms*）收录了雷克思罗斯十六首诗，其中十四首诗是译自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有学者关注雷克思罗斯创作的诗歌作品，讨论其诗学理念。国外对于雷克思罗斯的研究专著集中出版于20世纪70至90年代。摩根·吉布森（Morgan Gibson）在1972年出版了第一部雷克思罗斯研究专著《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该书主要梳理雷克思罗斯的创作生平，并结合其生平探讨截止至20世纪60年代末雷克思罗斯发表的诗集主题，对一些诗歌创作涉及的背景，如运用哪个版本的《道德经》做了部分考证。钟玲于同年完成以雷克思罗斯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中国诗歌——翻译、模仿与改写》（*Kenneth Rexroth and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Imitation, and Adaptation*），探讨雷克思罗斯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吸收与转化。此后，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

迄今为止，国外有四部研究专著。1986年摩根·吉布森在第一部专著《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出版了第二部专著《革命的雷克思罗斯——融合中西方智慧的诗人》（*Revolutionary Rexroth: Poet of East-West Wisdom*）。在这部专著中，吉布森从雷克思罗斯的生平、诗学主张¹、诗集简介、剧作简介、翻译观²以及雷克思罗斯的文化批评六个方面介绍他的创作生涯和特

1 其诗学主张为“诗歌是灵视”（Poetry is vision）。

2 其翻译观为同情翻译观（Act of Sympathy）。

点；该书另一特点是书后提供的参考文献给出了当时比较全面的与雷克思罗斯研究相关的书目及评论文章。1988年李·巴特利特（Lee Bartlett）出版了另一部《肯尼斯·雷克思罗斯》（*Kenneth Rexroth*），该书简单介绍雷克思罗斯生平及诗歌特点，分析了部分雷克思罗斯诗集的诗歌，简单介绍雷克思罗斯出版的一些论文集。1990年肯·克纳布（Ken Knabb）出版的《雷克思罗斯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Rexroth*）对雷克思罗斯生平、政治观和诗学主张（核心是高尚，*magnanimity*）做了简要介绍，对部分诗歌进行了分析。

国内对雷克思罗斯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以翻译引介其诗歌作品为主；及至90年代，学界主要探讨其诗歌翻译的正误；进入至21世纪，中国学者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作品研究兴趣逐渐浓厚，探讨的主题也日益深刻，主要关注中国文化对其诗歌作品的影响。目前关于雷克思罗斯的研究专著有两部，分别为郑燕虹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和迟欣的《中西合璧 古今交融——点击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郑燕虹的研究聚焦中国文化对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该书分别从中国古诗、道家思想、佛禅意趣等方面探讨这种影响；迟欣的研究关注中西方文化对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专著分别从雷克思罗斯诗歌的中西宗教渊源、哲学渊源以及艺术与文学渊源三方面来探讨这种影响。除以上六部专著外，国内外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还有博士论文数篇，各种评论文章和书评数百篇，对雷克思罗斯的研究还散见于各种研究“旧金山文艺复兴”，“垮掉一代”（*Beat Generation*）以及“反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s*）中。

总而言之，进入21世纪，学术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研究逐步升温，总体概述为“两冷两热”。两冷一是指在美国诗坛对雷克思罗斯研究的重视度并不高；二是指学院派中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尚未出现有分量的研究专著，对其关注度还有待加强。两热之一是指在美国西部文学，特别是旧金山文化圈的研究中雷克思罗斯一直是重点，二是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尤为关注雷克思罗斯诗歌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变异。评论界对其诗歌评论虽然关注点不同，但主要可以分为三个研究视角，即政治历史、生态环境及中国视角。其中中国视角最受关注，也是研究热点，相对于其他两个视角的研究，对中国视角的研究更加具体，成果更加丰富，研究内涵也更深刻。

（一）政治历史视角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一生见证了20世纪美国发展历程。一战后雷克思罗斯经历了资本主义繁荣发展时期，30年代他积极投身到工人罢工运动中，50年代雷克思罗斯是“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及至60年代雷克思罗斯参与反文化运动，故此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称雷克思罗斯的诗歌是美国知识分子政治气候的温度计（26）。尽管雷克思罗斯不是共产党员，但在30年代他积极参加一些左翼组织的活动，如参加无政府组织伦道夫·伯恩委员会（Randolph Bourne Council）、约翰·里德俱乐部（John Reed Club）、自由论者文化圈（the Libertarian Circle）和旧金山海滨工人协会（the Waterfront Workers Association in San Francisco）等组织的活动；二战时期雷克思罗斯是拒服兵役者之一（conscientious objectors），反对和抨击政府的政策是雷克思罗斯作为报纸专栏作者的议题之一；在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中，雷克思罗斯对其中涉及到的环境保护、女性解放等思想不仅完全赞同并在多年的诗歌实践中不断表达这些观点。他认为诗人应该是“普通百姓和弱者的同盟者和代言人”，是“社会特权阶层的敌人”（Morrow 1）。雷克思罗斯视诗歌创作作为社会改良的一种方式，他推崇无政府主义。虽然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中有大量反映诗人政治诉求的内容，但对于其诗歌中所体现的政治历史话题进行评论的专著尚未出现，有分量的评论文章也较少。有关他的政治与历史观的探讨在涉及到“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及西部文学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中也可看到相关讨论。

肯·克纳布在专著《雷克思罗斯的相关性》第三章“社会与革命”（“Society and Revolution”）中详细论述了雷克思罗斯的政治主张，即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克纳布认为雷克思罗斯不认同资本主义可以被政府机构或统治集权所废除，因为无论当初这个集权多么革命，它都想永久保持政权，也会接纳资本主义制度；同时社会改良主义在美国实践的失败使得雷克思罗斯变成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雷克思罗斯鼓励参与地方政治活动，提倡政治试验或自治。他认为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道德建设、伦理规范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这些问题在雷克思罗斯看来在现阶段无法得到解决。作为报纸专栏撰稿人，雷克思罗斯抨击政客、政府、商人和媒体

的腐败与勾结，他为人类与生态共同体的和谐相处遭到破坏而悲伤。克纳布继续指出雷克思罗斯对于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态度更多是消极的。雷克思罗斯认为讨论抗议歌曲和诗歌是错误的，因为“抗议就有可能带来更正，抗议是来自文化本身。抗议变为疏远，疏远最终会带来退出”（Rexroth, *The Alternative Society* 164）。

卡尔·扬（Karl Young）在文章《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抗议、反叛及其后》（“Kenneth Rexroth: Protest, Rebellion, and Beyond”）中进一步指出雷克思罗斯这种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干涉的立场导致他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持这种立场决定雷克思罗斯拒绝不加评判地接受工业革命带来物质进步这种普世观念。雷克思罗斯对未来的前景并不看好，因而他投向人类古代文明，譬如古希腊和中国唐宋时期，雷克思罗斯尤为称赞宋代文明，在他看来那个时期人民的生活更为和谐美好。具体反映在他的生活态度上，雷克思罗斯并不认为物质生活的富裕和奢华是幸福的，相反他提倡住在山间木屋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他的大量诗歌描写了自己在内华达山脉的生活经历。卡尔·扬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赞扬的是这种有尊严的贫穷生活。在他们看来，在任何社会中互相帮助以及自由和责任都是最为重要的内涵，人类无需经过革命斗争作为过渡阶段，因为这种社会准则早已在人们心中扎根，人类只须打破对于社会进步和权力的过度追求即可。扬认为纵观雷克思罗斯一生，他大部分时间远离文化中心，过着并不富裕但精神丰富的生活，有自己的哲学观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其诗歌充满哲学韵味。另一方面雷克思罗斯并不认同对社会的反抗与反叛。在他看来，一方面法国巴士底狱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并不能给社会带来新的变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奢华社会观对社会同样有害。卡尔·扬指出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反映出诗人这种既向往革命又排斥任何社会变动的心态。

虽然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的专著《旧金山文艺复兴——20世纪中期诗学及社区》（*The 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 Poetics and Community at Mid-century*）讨论重点是20世纪中期“旧金山文艺复兴”和“垮掉一代”诗人群的诗学诉求和特点，对雷克思罗斯诗歌讨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但戴维森结合雷克思罗斯诗歌文本的分析对于研究其政治观极有帮助。戴维森对雷克思罗斯的政治观定义为矛盾的政治观，即观察多，行动少。雷克思罗斯反

对政府统治的权威，反对单一文化，他擅长在诗歌中以雄浑的自然景观为背景，抒发这些政治主张。戴维森总结雷克思罗斯诗歌特色之一为这些诗歌或感慨以往政治抱负无法实现，或抒发对政府的不满。戴维森以短诗《攀登迈尔斯通山脉，8月22日，1937》（“Climbing Milestone Mountain, August 22, 1937”）为例，诗人1937年登上迈尔斯通山顶，想到的却是1920年波士顿两位无政府主义者萨科和万泽蒂（Sacco and Vanzetti）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判死刑，电死在行刑椅上。诗歌以雄伟的山脉作为殉难场而结尾，高山成为人们寄托哀思之地（41-43）。

琳达·哈玛莲（Linda Hamalian）在文章《地域主义使得一切美好——旧金山文艺复兴》（“Regionalism Makes Good: The 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中结合时代背景，追溯雷克思罗斯从早期参加工人运动时的激进思想到“垮掉一代”时期的思想变化。哈玛莲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雷克思罗斯都创作出诗歌反映他对当时政治或历史事件的看法，雷克思罗斯的诗学诉求与其政治主张紧密结合。哈玛莲总结雷克思罗斯的政治诉求为追求社会民主、提倡种族、阶层和地区之间相互平等。具体到诗人的责任，哈玛莲的研究指出雷克思罗斯强调诗人不应成为金钱的奴隶，而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在诗歌语言运用上雷克思罗斯提倡用劳动人民日常语言进行诗歌创作。在文章中哈玛莲以短诗《在沿海山脉远足》（“Hiking on the Coast Range”）为例分析雷克思罗斯早期的激进思想。这首诗歌是为纪念1934年7月16日在海员大罢工中死于警察残暴镇压的工人而作，自然的美景与死去工人的鲜血形成鲜明对比，“血迹斑斑 / 粘在蓝白花纹的围巾上”（*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146）。¹ 诗人控诉在血腥镇压和暴力之下，人类道德都已沦丧（214-217）。

从以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雷克思罗斯创作了大量表达政治诉求的诗歌，散落在不同历史时期。从政治历史视角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有广阔空间，对这一话题也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讨。

（二）生态环境视角

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以自然描写见长，他的大量流传广泛的诗歌创作于加州

1 本综述所有雷克思罗斯诗歌翻译均为笔者自译。

内华达山区。从生态环境视角入手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也是学者关注的内容。关于雷克思罗斯诗歌中所探讨的自然与人关系的话题，学者共同认可的观点是雷克思罗斯的生态观是“有机统一观。”

唐纳德·古铁雷斯 (Donald Gutierrez) 在文章《自然的超自然主义——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he Nature Poetry of Kenneth Rexroth”) 中指出雷克思罗斯诗歌特色是在自然中看到超自然。雷克思罗斯借 19 世纪科学家约翰·廷德尔 (John Tyndall) 之口说出：“对于这个小地方的关注 / 被地球轴心的倾斜而改变， / 有一条相互依存的链贯穿万物， / 联系天体的运行 / 并与旱獭和人类的利益相关联” (*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167)。雷克思罗斯诗歌描写的是自然中不同寻常、非浪漫的事件，最终将其上升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这种意象暗含超自然的秩序，以及自然与其的相互联系。这种难以捉摸的简明、形象和独一无二的意象赋予读者联想的能力。古铁雷斯的研究表明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因为对于外部客观自然世界的细腻描写，给读者呈现的是一种客观性的超现实 (objective super-reality) 世界，例如“就在月落前，一块小小的厚积云， / 像一串金属葡萄， / 飘过内华达山脉山顶向西部的山坡飘下” (“Toward an Organic Philosophy”) (Hamill and Morrow 166)。这是一种超越自然景象的书写，是一种对神既敬畏又向往的感情交织，即圣秘 (numinosity)。与浪漫主义诗歌常沉溺于自我情感的浪漫抒发或对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慨不同，雷克思罗斯自然诗歌描写的是面对荒野，人类意识到自身能力的局限甚或面临死亡威胁，如果能够在如此艰难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人类对于自然的态度不仅是予以接纳，甚至产生感激的心情。在此基础上，这种被人类完全欣赏的“客观”自然环境变成了主观的、人类自身的一部分。自然是一面镜子，反映了人和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的现实，即雷克思罗斯称作之的共同体。古铁雷斯总结说，从描写自然到反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不是对自然环境浪漫化的书写，而是对地球、世俗化的生活以及人类现世生活的真实记录 (405-421)。

乔治·莱斯利·哈特 (George Leslie Hart) 的博士论文《后现代主义和新浪漫主义自然诗学》(*The Poetics of Postmodernist and Neoromantic Nature Poetry*) 虽然把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划归为新浪漫主义诗歌，一种盛行于二战后

及当代的诗歌风格，但他也承认在雷克思罗斯等新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作品中，诗人在精神、心理与哲学层面与自然相联系。这些诗歌的特点是表现内在性、有机性、主体性和相互依存，与后现代诗歌呈现的距离性、非个人性及缺场形成对比。实际上哈特在论述中多次强调其研究对象是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指出其自然诗歌中的一大特色是凸显自然景物，通过运用诗人自身对于自然的认知和经历，如在美国国家公园和加州的旅游和生活经历，使之成为非人类的自然环境的最好代言。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着重描述荒野中自然景象及其蕴含的荒野精神。哈特以雷克思罗斯的《走向有机哲学》（“*Toward an Organic Philosophy*”）为例说明其自然诗歌特点。这首诗呈现的是万事万物皆为一体的观念，诗人把自己看成宏观中的一个微观物，和臭鼬、松鼠、苹果树、星云等均互为联系。哈特分析道，在该诗中诗人所表达的诗与生命哲学的关系就是生态批评关系，诗人通过季节、时间以及观察角度的转换，在诗歌中忠实呈现出自然的变迁（61-88）。

大卫·兰迪斯·巴恩希尔（David Landis Barnhill）在文章《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有机世界观》（“*A Community of Love: Kenneth Rexroth's Organic Worldview*”）中提出雷克思罗斯的有机世界观包含三方面：人与环境、人与社会和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巴恩希尔在这篇文章中以生态社会主义视角研究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作品。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作为政治与自然的结合，强调生态背后所指向的社会与政治因素。巴恩希尔的研究阐明雷克思罗斯认为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相联系，二者尚未建立一个真实健康的共同体。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即人压迫自然；关于人与社会，巴恩希尔指出雷克思罗斯认为在社会中人压迫人，其诗歌呈现的多是人被社会消灭、人的创造性被压制、人类成为集权和经济制度的奴仆等这些反乌托邦景象。雷克思罗斯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制度，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人类只追逐利益，而逐利导致人与人的疏远。巴恩希尔认为雷克思罗斯的生态世界观是有机统一的，他的自然诗歌的关注点从生态扩展到人类社会，强调要建立一个充满爱的社区。在这个社区中，自然与人以及社区是个神圣的共同体，人在这个动态的网中与万物相互依存，政治与伦理也互为一体。最终巴恩希尔总结道，在雷克思罗斯的有机世界观中，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与集体共为一体，在无政府

主义的公有制社会中相互融合，互助互爱（2-25）。

“有机哲学”（organic philosophy）是雷克思罗斯在其自然诗歌中不断强调的主题，但雷克思罗斯的自然诗歌又有其特色，即神秘性。他的诗歌没有单纯自然书写，虽然雷克思罗斯偶尔在诗歌中批判人类对于自然的破坏，但这种批判并不常见。更为常见的是其自然诗歌的结尾总是出现神秘的力量，诗人在与宇宙万物的共同联系中得到顿悟，心灵得以安置。在笔者看来也许这是经过生态批评运动发展的几次浪潮，在重新挖掘自然书写、形成新的生态批评文本经典化的过程中雷克思罗斯诗歌从未真正进入到生态批评家考量范围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通过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可知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道家思想中的“道”，雷克思罗斯自然诗歌中所蕴含的哲理即是道家思想。

（三）中国视角

相比评论家从政治历史及生态环境两个视角对雷克思罗斯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匮乏的现状，学者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中国视角上。因其诗歌以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转化为特色，雷克思罗斯成为继庞德之后学者们最为关注的美国诗人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对于雷克思罗斯的研究比对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的研究薄弱，但近十年对雷克思罗斯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在国外学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中国元素的研究早已成为中西比较诗学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叶维廉、钟玲与赵毅衡对此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

叶维廉、钟玲与赵毅衡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均放置在探讨中国模式如何影响美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框架下。叶维廉在专著《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中追寻美国现代诗歌“物自性”（the thing itself），最终将其渊源追寻到中国道家思想。赵毅衡在《诗神远游——中国诗如何改变美国现代诗》一书中以美国现代诗为线索，横向研究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如何影响美国现代诗歌。赵毅衡研究的另一特点是重视一手资料的查询，其研究结合中国古典诗歌传播时的诗歌研究背景。钟玲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起步最早，成果颇丰，她对雷克思罗斯诗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博士论文《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中国诗歌——翻译、模仿与改写》及专著《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

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和《中国禅与美国文学》中。钟玲从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入手，随后逐步扩大为探讨美国现代诗歌里的中国文化模式，涵盖道家思想和禅宗的影响。从中国视角对雷克思罗斯诗歌所做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古典诗歌的影响、禅宗的影响和道家思想的影响。

1. 古典诗歌的影响

有关古典诗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影响研究，钟玲是研究最早的学者，其后虽不断有学者的研究涉及古典诗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但钟玲的研究涵盖面最广，所以从古典诗歌影响这个角度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研究进行综述基本以钟玲的研究为主，辅以赵毅衡的评述。

钟玲在博士论文《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中国诗歌——翻译、模仿与改写》中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并以此为开端进入雷克思罗斯诗歌的研究领域。在专著《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钟玲着重探讨了中国诗词歌赋的视野和格律对于美国现代诗歌的影响，雷克思罗斯是书中重点讨论的诗人之一。钟玲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研究全面，包含短诗、长诗、诗剧和译诗；二是有关中国诗对他的影响探讨覆盖面全，具体可以分为诗歌主题、表现手法和诗剧中中国思想的影响；三是影响结果考察全面，既关注雷克思罗斯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吸收，又考证这一影响在其诗歌中产生的变异。钟玲的研究指出雷克思罗斯在诗歌创作中主要采用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手法和意象运用（*Kenneth Rexroth and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Imitation, and Adaptation* 161），在她看来，对雷克思罗斯影响最大的两位中国诗人分别为唐代诗人杜甫和元稹。

钟玲在论文《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中国诗歌——翻译、模仿与改写》中详细考证了雷克思罗斯吸收、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根据钟玲的考证，雷克思罗斯首先通过翻译古典诗歌，掌握了中国诗歌中的意象、对仗等诗歌创作手法。雷克思罗斯本人对杜甫评价很高，他在《杜甫诗歌》（“Tu Fu Poems”）中提到“我已浸泡在杜甫诗中四十年”，强调正是杜甫诗歌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敏感且有感知力的有机体”（Rexroth, *Classics*

Revisited 131)。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雷克思罗斯共翻译了三十六首杜甫诗歌。钟玲在文章《体验和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中考证了雷克思罗斯翻译杜甫诗歌的过程，从其翻译时参照的杜甫诗歌译文版本到雷克思罗斯对杜甫诗歌的改写，这些翻译之作在钟玲看来都是“体验杜诗，另写的创作”（163），这些体验对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创作带来很大影响。钟玲在《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对雷克思罗斯处理杜甫诗中的意象评价颇高。她以杜甫的《杜位宅守岁》（“Winter Dawn”）（*One Hundred Poems from the Chinese* 5）为例，原诗的最后四句为“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雷克思罗斯在译文中把“烂醉”的“烂”拆开，改写为“醉了的野火”（drunken wildfire），这四句的译文为“In the winter dawn I will face /My fortieth year. Borne headlong /Towards the long shadows of sunset /By the headstrong, stubborn moments, /Life whirls past like drunken wildfire.”在钟玲看来，雷克思罗斯将杜甫原文呈现的诗人对自己老之将至的感怀改为从大处着眼，对全人类生命的领悟，这种改写使其意象更为强烈而鲜明（53）。

雷克思罗斯提出自己诗歌创作遵循“中国式法则”（a kind of Chinese rule）（Rexroth, *Classics Revisited* 130），对此钟玲在《体验和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一文中解释为这种法则就是在诗中表现具体的图景、动作及诉诸五官的意象（144）。钟玲的研究表明杜甫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其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她在论文《肯尼斯·雷克思罗斯和中国诗歌——翻译、模仿与改写》中分析了雷克思罗斯常用的意象，如在《落叶与初雪》（“Falling Leaves and Early Snow”）中，雷克思罗斯用了“薄云”（blades of cloud）和“雨后放晴”（clear after rain），这些都来自杜甫诗句“天际秋云薄”（181）。月亮是雷克思罗斯诗歌中常用的另一个意象，比如在《一颗活着的珍珠》（“A Living Pearl”）中，月光揭示了自然的神秘力量：“我们的营火已经熄灭 / 在孤独的大山中。/ 透明的月光一泻千里”（*The Complete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533）。据钟玲考据，这个意象来自于杜甫《月圆》中的“未缺空山静，/……/ 万里共清辉”（189）。

赵毅衡在专著《诗神远游——中国诗如何改变美国现代诗》中提到主要受

中国古典诗歌影响的美国现当代诗人共三十多人。具体到雷克思罗斯，赵毅衡指出雷克思罗斯的不少“中国诗”有典型的中国山水意象（52），比如《红枫叶》（“Red Maple Leaves”）写他驱车驶过小城，那里曾住过他年轻时的恋人，结尾写道：“我沿着河驶去，/看到桥上有一个孩子在钓鱼，/在清澈的河水中，/在漂浮的落叶里”（Hamill and Morrow 699）。

钟玲在《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提出雷克思罗斯对元稹的认识来自宾纳英译的元稹悼亡诗。雷克思罗斯认为宾纳的译作可以看成是美国当代诗歌的杰作（*Assays* 37）。雷克思罗斯在自己诗歌创作上运用了元稹悼亡诗《遣悲怀》里的意念和论述方式，如在悼亡第一任妻子安德蕾（Andrée）的诗歌《安德蕾·雷克思罗斯》（“Andrée Rexroth”）中写道，“他们现在都逝去了，这些日子/我们曾经以为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一切都到来了”（*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154）。这里雷克思罗斯用到元稹《遣悲怀》中的意象：“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全唐诗》卷404，4509页）。在钟玲看来，雷克思罗斯在丧妻的沉痛悲伤中，元稹的诗不仅引发诗人的同感，更让诗人在仿写中解除压抑自己的痛苦。这种影响已不仅是诗人在诗歌创作技巧中的创新，更多是诗人的精神共鸣（25）。

在诗歌创作风格上，钟玲的研究也指出雷克思罗斯借鉴了“感怀体”诗歌。她在《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以杜甫的《阁夜》和雷克思罗斯的《五十岁》（“Fifty”）为例，详细说明雷克思罗斯在诗歌中如何借鉴这种中国古典诗歌的思维模式，即借着观望及感受客体而引发主体之情感。《阁夜》开始写主体感受，“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然后描写人世这种客体，“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伐，/夷歌数处起渔樵”，最后以主体个人感受终结，“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这种论述过程绝大部分书写客体事物，到结尾才转向主体感受。雷克思罗斯的很多诗歌运用这样的论述方式，比如《五十岁》“阴雨笼罩的天空，雾蒙蒙的高山，/过去的一年在暴风雨中逝去。/新年一如既往地来临。/一整天，从远处的海上，/长翅的海鸟翱翔在天空上/飞翔。午夜来临/疾驰的云彩与下落的月亮，/罕见的大片繁星。/我的五十岁生日已经到来”（*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236)。钟玲分析道，在该诗中诗人由自然客体转向主体的醒悟，似乎大自然的深刻观照令叙述者感触深刻，而宇宙运行又呼应叙述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109-111）。钟玲在文章《体验和创作——评王红公英译的杜甫诗》中考证雷克思罗斯在翻译杜甫诗歌时多次处理过类似的例子，因而对“感怀体”诗歌的领悟很深（121-163）。

雷克思罗斯在多篇论述及诗歌会议上大力提倡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方法，认为在中国诗歌中暗喻及各种象征皆是意象本身彼此具体的关系（Rexroth, *Classical Revisited* 130）。雷克思罗斯参加过1977年4月23-27日美国诗人学会（The Academy of American Poets）在纽约举办的“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Chinese Poetry and American Imagination Conference），应邀参加会议的共十三人，包括七名诗人，如雷克思罗斯、斯奈德、勃莱、詹姆斯·赖特、默温等，还有学者和译者六人，包括叶维廉、钟玲、汉斯·弗莱克尔（Hans Frankel）、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imore）和乔纳森·查维斯（Jonathan Chaves）等。雷克思罗斯甚至在会议上说远东诗歌对现代美国诗歌的影响大于19至20世纪法国诗歌的影响，并且远大于自己的传统，即19世纪英美诗歌的影响。对此钟玲有清醒的认识，她在《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提出雷克思罗斯之所以有如此观点，是因为他未能区分影响（influence）和文学成俗（convention）的关系，其实雷克思罗斯所谓的远东诗歌论述方式是一种20世纪诗歌的文学成俗（19）。尽管如此，中国古典诗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毋庸置疑。

虽然钟玲在古典诗歌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影响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对于这种影响的探讨还需进一步深入，比如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如何仿照和改写杜甫诗歌，以及运用其他诗人如刘禹锡诗歌中燕子归巢等意象和表达方式，还需要更多实证考察。钟玲认为与其说雷克思罗斯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不如说作为诗人，雷克思罗斯有自己喜好的主题及表达方式，在选择翻译中国诗人的诗歌上，这种倾向起了主导作用。可以说钟玲在研究中对于雷克思罗斯为何选择翻译杜甫的三十六首诗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同时也解释了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如何把杜甫的形象塑造成“一个生活方式简单的人，对大自然的迹象眼光敏锐……”（Kahn 83）的人，但对于雷克思罗斯为何选择翻译其

他诗人，如柳宗元、刘禹锡、屈原、欧阳修等，以及为何选取他们的诗歌进行翻译，这些还需要充分考证和论述，这也为古典诗歌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影响研究留足了空间。

2. 禅宗的影响

佛教对于美国现代诗歌的创作也有一定影响。阿伦·约翰斯顿（Allan Johnston）和耿纪永的文章共同关注到雷克思罗斯诗歌中所体现的佛家思想，两篇文章都是从《华严经》“帝网天珠”的意象来探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体现的生态整体观。但实际上钟玲在专著《中国禅与美国文学》中考证出禅宗思想对于美国现代诗人的创作影响更大。钟玲在该书中专门探讨美国文学如何吸收中国禅宗文化。具体到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宗思想，钟玲的研究主要涉及其诗歌中的禅意以及“空”和禅宗思维在其诗歌中的体现。

阿伦·约翰斯顿在文章《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歌中自然的“三面镜子”》（“‘The Triple Mirrors’ of Nature in the Poetry of Kenneth Rexroth”）中提出雷克思罗斯诗论的核心“灵视”（Vision）为人类对自然认知上存在的主客体差距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中国诗歌在书写宇宙万物时呈现的是没有人类道德评判的景象，雷克思罗斯认为这和其诗歌“灵视”观完全一致。通过模仿中国诗歌，雷克思罗斯诗歌意境中既展现出客观景象，又融合了诗人的主观理解。约翰斯顿指出，雷克思罗斯认识到在宇宙中万物相互投映，他对宇宙多角度的认识来源于佛教《华严经》的“帝网天珠”，即一珠现一切珠影，一切珠尽现一珠之中。雷克思罗斯的诗歌通过对人与自然的相互镜像反映，恢复了人与自然的本来面貌，也就是“唯一有效的价值保存于无限的联系中”（*The Collected Longer Poems ix*）。在雷克思罗斯看来，万事万物相互关联；在“灵视”中，自我被自然反映而不是自然反映在自我之中；现在与过去重叠，互相映射，现时被赋予意义并得到增强；自然的普遍意义存在于人类的个体价值中。约翰斯顿继续分析道，雷克思罗斯称自我为个体的“最终核心”，也就是佛教的“如”，一种关于自我的认识论，自我和意识不是截然分离，而是二者和周围环境相互联系。在雷克思罗斯看来，价值存在于相互联系或映射之中。约翰斯顿的总结为，雷克思罗斯诗歌中自然的“三面镜子”反映出他的生态整体观，即自我通过映射他者、具体事物和宇宙万物，得以最终实现其价值（81-93）。

耿纪永在文章《论王红公的生态哲学与佛禅思想》中从雷克思罗斯与佛禅的因缘入手，探讨雷克思罗斯的生态哲学整体观是对华严宗的吸收以及其变易思想对无常观的吸纳。耿纪永指出生态整体观和联系观是雷克思罗斯生态哲学中最核心的思想，例如在《走向有机哲学》一诗的结尾，他借十九世纪科学家约翰·廷德尔之口说：“对于这个地方的关注 / 被地球轴心的倾斜而改变， / 有一条相互依存的链贯穿万物， / 联系天体的运行 / 并与旱獭和人类的利益相关联”（*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104）。雷克思罗斯更喜欢采用佛教华严宗的思想和意象来表达自己的整体观和联系观。整体观也是佛禅生态观的重要特征。佛教认为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各种条件和合而成，不是孤立的存在，也即“缘起”。耿纪永以《他们说这不是一首诗》（“They Say This Isn't a Poem”）为例，阐释该诗中的佛教缘起思想：“所有存在都是依条件而定的， / 没有什么是独立存在的。 / 所有事物都由于他物而改变。 / 没有事物孤立运动。 / 所有存在都缘起于他者。 / 没有存在缘起于自身”（Hamill and Morrow 598）。雷克思罗斯在使用因陀罗网¹（Indra net）意象表现生态整体和联系观时，特别强调该网的动态性。在耿纪永看来，雷克思罗斯在其哲学观形成的后期，尤其是1967年以后，经常将自己的变易思想和无常联系起来。如《另一个春天》（“Another Spring”）描写了四季的流转和月亮的圆缺：“季节更替年复一年 / 没有帮助也没有监督。 / 月亮，无心地， / 按周期运转， / 满月，新月，再满月”（Hamill and Morrow 211）。耿纪永认为雷克思罗斯在诗歌中也将生态循环与人的生死轮回交织在一起，如诗歌《龙与独角兽》中写道，“实际上，时间概念 / 源自于宇宙间 / 伟大的有机循环的相互交织， / 太阳升起与落下， / 月亮的盈与亏， / 星宿更替与季节轮换， / 太阳在地平线的升起与落下， / 播种与收获的更替， / 人的生死轮回”（Hamill and Morrow 324）。耿纪永总结道，雷克思罗斯是一位敏锐而超前的思想家，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生态危机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时，他已经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发展出了一套成熟的生态哲学观（96-102）。

1 “因陀罗网”是传说中帝释天宫中悬挂的结有无数宝珠的网，一珠映一切珠，珠珠皆然，以此比喻佛教各种法门及各种现象之间相互映现，均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然一体的状态（境界）。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凤凰出版社，2002。第38页。

钟玲在《中国禅与美国文学》中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探讨中国禅怎样传入美国文学界，美国文学作品吸收了中国禅文学的何种养分，以及“禅文化对美国文学产生怎样冲击”（1）。书中讨论的作家超过四十位，以欧、英、犹太裔学佛或禅修的美国作者为主，肯尼斯·雷克思罗斯是钟玲的研究对象之一。涉及到禅宗对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影响，钟玲分别探讨了其诗歌中的禅意以及“空”和禅宗思维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体现。首先有关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她以诗歌《星与新月》（“Stars and Crescent”）（Hamill and Morrow 700）为例。钟玲认为本诗融入王维《鹿柴》这首评论家公认的禅趣诗，体现了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意象。雷克思罗斯在诗中连用了三个这类意象，如鸟细微的啁啾，有人捣东西的声音从林中传来，最后是静默中有人说话，因为本诗描写了敲钟与打坐之事，可以知道地点应该是在一座寺院，故此钟玲推断说话的人有可能是说法的禅师。钟玲进一步指出这首诗的禅意是静默背后有灵动，作者心情非常宁静，内心进入清净的状态观察细微，如气温的变化带来大自然的变化，树叶的味道是暮夏太阳晒出来的味道，因为天暗转凉而生露，又令灰尘凉下来。及至“空”的含义，钟玲以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只有空》（“Void Only”）（Hamill and Morrow 701）为例，指出这首诗诠释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道理。在诗中有“色”的“巨蛇”化为透明，消失了，“空”又化为歌声，在心中成形（305）。具体到禅宗思维，钟玲指出佛教提出二元对立之外的其他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禅宗中也不例外，如“正即是反，反即是正”（《心经》中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思维打破二元对立，令二元混同，中间的东西可以涵盖一切；或“不正不反”（《心经》中的“不生不灭”），这正是“中间的东西”。甚至以“无”，一种因觉悟而产生之否定，来突破及否定一切，得到心灵的、无挂碍的自由，这“无”可说是在正、反、中间以外了（300）。不仅《心经》如此，《金刚经》和《坛经》都重视此“中间的东西”，而且其存在还有各种可能性，二元对立的思维是佛教思想要破除的执见。钟玲以雷克思罗斯的《蓝色星期日》（“Blue Sunday”）（Hamill and Morrow 693-694）为例，指出该诗充分吸收了《心经》《金刚经》中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城里没人居住。/在城外的界线外/是绿色和白色的坟地。”实际上城市里有人，诗中提到三个妓女，还有“医院和煮食的味道”，但诗人却说“城里没人”。此诗

呈现出一个城，城中的一切都不是实相，所有感觉都是虚妄的。这首诗体现了《金刚经》中“非相”、“非众生”的观念，把城写成在虚实之间的存在，把熟悉的虚实二元观念否定，中间的东西就是那些物，如坟场、喷泉、太阳、群星、空城和纸张（300-302）。

钟玲认为，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中所体现的禅宗思想进行分析的弊端是只能选择个别有特殊含义的诗歌进行分析，因为没有整体诗歌的考量，只能在禅意禅趣上简单分析，而禅宗的基本概念如“空”也因诗歌文本选择有限，不能深入分析，同时诗歌中佛道思想也常在一起，不好区分。笔者完全同意钟玲的观点。除此之外，肯·克纳布强调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作品虽然受到禅宗影响，但事实上他对禅宗的很多观点持批评态度，如认为西方对于禅宗观点的接受更多是追求时尚；同时他抨击日本禅宗，在雷克思罗斯看来，日本禅宗从幕府时期及至二战已沦为战争工具。事实上雷克思罗斯更崇尚道家思想（20-21）。

3. 道家思想的影响

对于雷克思罗斯诗歌中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裔和国内学者的研究上，以叶维廉、钟玲、郑燕虹和迟欣的研究为代表。叶维廉在《道家美学与西方文化》中追寻美国现代诗歌“物自性”（the thing itself）的渊源时追溯到道家思想，认为道家思想影响了美国现代诗歌。该书重点以庞德、史蒂文斯、威廉斯、雷克思罗斯和斯奈德的诗歌为例，探讨“物自性”在美国现代诗歌中的体现。叶维廉重点考察这些现代诗人如何在诗歌中“肯定物之为物之本能本样，肯定物的自性”，也就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65）。据此叶维廉提出“无言独化”（empty language, self-transforming nature）的概念，他认为正是有了诗人在语言上的“无为”，才体现出自然的未加沉思的“自然”之美（“Language and the Real-Life World” 65）。叶维廉提出的道家“无言”（transparent language）就是物之原初的状态通过诗人不加任何主观修饰的语言而表达出来（“Stalling” 137）。他进一步指出“无言”来自于六朝山水诗（“landscape” poetry），诗人要释放物之为物的特性，恢复物之本貌，诗人所做的是最大程度呈现出对于事物本初状态的感知（*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 130）。具体到雷克思罗斯，叶维廉重点考证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如何阐释道家“无言独化”的世界，他以雷克思罗斯的诗歌《另一个

春天》(“Another Spring”)为例:“季节更替年复一年 / 没有帮助也没有监督”(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145)。叶维廉解释道:“无言独化”的世界是在我们身体外思想自生自化自主自足的自然现象,回到人自然自发的本质,人与物便可以直接互印互会。根据叶维廉的分析,雷克思罗斯的诗歌体现出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方面,是诗人在诗歌中几乎没有陈述,使读者处在自主自性的自然景物中,实际看到、感到、听到和仿佛嗅到和触摸到自然的活动与生变(69-72)。

钟玲在《美国诗与中国梦:美国现代诗里的中国文化模式》中指出雷克思罗斯诗歌主要吸收了“无为”的思想,以及有与无、阴与阳等二极交流轮替的观念,其诗歌体现了道家“无为”思想。钟玲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中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以长诗《心的花园,花园的心》(“The Heart’s Garden, The Garden’s Heart”)为例。她分析道,在该诗第一节,诗人完全融入了《道德经》第六章的内容,也是这一节的思想核心。在这节中老人是诗人的化身,在月光中采蘑菇,采笋,表现了“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思想,第一节中描写的田园景物皆为“用之不勤”之物。该诗第二、三、四节都以水为意象开始,也以水为意象结束。以“水”为沉思生命哲学的对象,在钟玲看来呼应了《道德经》中“上善若水”(第八章)的概念。钟玲还指出该诗更是结合了道家“无”的观念,如“水 / 流淌并绕过所有障碍, / 总是流向最低处。 / 相同与相反,行动与再次行动, / 一束看不见的光线 / 毫不费力向上攀爬”(Hamill and Morrow 667)。这一段的水与光两种元素,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运作的方向都是与常理相反,有点类似阴阳两极的运行;阴气下降为地,阳气上升为天。钟玲继续分析道在《心的花园,花园的心》中阴阳二极的观念已经成为主要思想,全诗结尾,阴极与阳极由重逢而结合成太极图之圆满,而诗人则升华到空无境界得到解脱(91)。

具体到道家“无为”(doing nothing)思想,钟玲在该书中以《空镜子》(“Empty Mirror”)为例,指出此诗阐述了不要为任何目的而行动的“无为”观,如“只要我们迷失在 / 有目的的世界里 / 我们就没有自由”(The 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Kenneth Rexroth 223)。钟玲还指出该诗最后以“蛇蜕的皮和一块不曾雕刻过的石头”结尾,这正是“朴”的意象。蛇蜕的皮象征大自然的变

化，不曾雕刻的石头则呼应了《道德经》的“朴”：“朴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宾”（三十三章）（93）。在钟玲看来，正是因为《空镜子》以类似《道德经》中“朴”的意象作结尾，于是该诗出现了道家论述的文本，形成此诗的独特风格（92）。

比较叶维廉阐释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无言独化”与钟玲研究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无为”，二者谈论的共同话题是道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无为”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体现，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道家的“无为”指不加入人为干涉，让物保持本来面貌。叶维廉关注的是在诗歌写作技巧上如何运用“无为”的观念，也就是诗人要“无言”；钟玲更关注雷克思罗斯诗歌主题上表达了何种“无为”思想，即雷克思罗斯通过诗歌所表达的诗学诉求。郑燕虹和迟欣的研究在钟玲基础上继续探讨雷克思罗斯诗学诉求中体现出何种道家思想。

郑燕虹的专著《肯尼斯·雷克思罗斯与中国文化》谈论中国文化对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影响，其中道家思想影响是该书的一章。涉及到道家思想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体现，郑燕虹的研究特色在于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体现的“阴与阳”的观念进行了细致分析。她以雷克思罗斯的《阴与阳》（“Yin and Yang”）这首诗为例，分析该诗中表现的阴与阳两个对立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郑燕虹指出根据中国阴阳观，“冬”与“海”属阴，“夏”和“山”属阳，“冬日的星辰落入海面。/ 夏日的星辰从山脉中升起”（Hamill and Morrow 655），这里暗含了阴阳交替相互作用，万物复生的思想。郑燕虹继续分析道，雷克思罗斯将阴阳观念暗含在西方天文学和神话背景中：“月亮”在“狮子座”与“处女座”之间交递，“太阳”在阴曹中的“‘是’鱼与‘非’鱼之间游动”（Hamill and Morrow 655）。诗中的“是”鱼与“非”鱼象征着太极图中的阴阳双鱼，月亮、处女座、阴曹代表阴极，太阳、狮子座代表阳极。郑燕虹总结该诗体现了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以及“阴阳备物，化变乃生”等思想（153-154）。

迟欣的专著《中西合璧 古今交融——点击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探索雷克思罗斯诗歌创作的渊源，其中既包含东方宗教、哲学和文学，又涉及西方宗教、哲学和艺术的影响。具体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迟欣的研究特色在于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体现出的“反者道之动”思想进行分析。“反者道之动”

体现的是“道”的基本法则，即万物与一切现象处于经常的运动和变化之中，万物与一切现象都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迟欣也是以雷克思罗斯的诗歌《阴与阳》（“Yin and Yang”）为例，在分析中她着重凸显该诗中表现出的事物变化的思想；“在地狱的屋顶亮光中 / 宣布复活仪式的高潮 / 从地狱中升起。 / 太阳在地狱中游动 / 穿梭在‘是’鱼与‘非’鱼之间”（Hamill and Morrow 655）。根据迟欣的分析，雷克思罗斯意识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世界万物都处在永恒不息的运动变化中，但这种变化在事物内部，它们是自己运动、自己变化；万物都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的统一，因而“相反”的现象普遍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故此迟欣总结道，该诗表现出事物达到一定的高度自然会走向反面，由小及大，由高向低，由近及远，由易而难，由强变弱，由柔转刚，事物必然在两极当中游弋（97-98）。

郑燕虹和迟欣的研究对国内雷克思罗斯诗歌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她们对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体现出的“复归于朴”“上善若水”和“自然无为”思想的研究采用的是影响研究中的传统视角，尚未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关注这些道家思想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产生的变化。除此之外，她们对雷克思罗斯诗歌文本的选择范围较小，主要围绕《空镜子》《阴与阳》和《心的花园，花园的心》三首诗歌展开论述，尤其是长诗《心的花园，花园的心》没有完整阐释；再次，她们在诗歌论述层面上也没有进一步深入，比如对“朴”的思想，只是分析了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用“未雕刻的石头”（an uncut stone）这个意象所体现出的“返朴归真”思想，但雷克思罗斯诗歌中还体现出“朴”的不同层面的含义，如“无欲而民自朴”等并未纳入她们的讨论之中。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郑燕虹和迟欣在钟玲的基础上研究继续深入，但研究的视角和深度还需进一步加强，诗歌选取上也有待拓展，在雷克思罗斯诗学和道家思想的结合处还有很大的空间可继续研究。

本书采用非常明晰的道家研究视角，对《道德经》在雷克思罗斯诗歌的吸收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现象进行仔细分析，着重考察雷克思罗斯诗歌所吸收的《道德经》的具体概念，考证这些道家概念在他诗歌中的接受与影响，关注《道德经》中的具体概念在他诗歌中呈现出的变异，探讨变异后的道家概念在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具体意义。迄今为止，还没有人集中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